

doi: 10.19920/j.cnki.jmsc.2025.11.004

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促进作用：中国经验^①

牛 耕¹, 何雨可^{2*}, 赵国昌¹

(1.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成都 611130; 2.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成都 611130)

摘要: 社会信用体系是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保障。近年来, 我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走出了一条成体系、全方位和数字化的特色道路。利用工商企业注册数据, 基于全国创建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政策背景,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 以信用示范创建城市为载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政策效果表现为商务诚信、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创业。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社会信任水平和法治化程度高的地区,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 说明信任文化塑造和法治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本研究从创业的视角评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经济效应, 提供了有为政府塑造有效市场的中国经验, 对于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also 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信用体系建设; 治理现代化; 有为政府; 创业活力

中图分类号: F8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25)11-0046-16

0 引 言

社会信用是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要构成。近年来,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22 年 3 月,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强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对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高效畅通、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随后,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其中就包括“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 要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同时, “弘扬诚信文化, 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 对于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际学术界较为推崇英美海洋法系下以私营征信机构为主体的“征信局(Credit Bureau)”信用建设模式, 对大陆法系下强调政府作用、以公共征信机构为主体的信用建设模式颇有质疑^[1, 2]。我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 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蓝图。具体表现在: 1) 政府主导, 中央银行运作。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没有采取单纯的市场模式或政府模式, 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赋能模式^[3], 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全面规划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立法和制度建设、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以及培育社会诚信意识等方面; 2) 范围广、全方位。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不仅包括围绕着经济交易和金融活动

① 收稿日期: 2023-01-15; 修订日期: 2024-05-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23XJC7900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2573125; 7190416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JBK202511054; JBK2307083)。

通讯作者: 何雨可(1998—), 女, 安徽怀宁人, 博士, 助理研究员。Email: yuke.he@swufe.edu.cn

展开的商业征信系统,也包含政务诚信、司法公信和社会诚信等社会治理各方面的内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建设有机结合;3)与数字经济建设深度融合.技术赋能与技术治理相结合是中国政府治理的经验与优势之一^[4],我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积极融入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数字科技手段,呈现出高度的数字化、平台化、智慧化等特征.例如,创建信用示范城市的关键措施之一是搭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该数字化平台囊括的信息比公有征信中心提供的信用报告更为丰富,信息颗粒度更细.

国外关于信用体系的相关研究可以根据征信业务分为三类,一些学者聚焦于资本市场,考察了信用评级对债券定价和资产价格的影响^[5];一些学者聚焦于普通中小企业市场,研究信贷可得性对于创业和企业绩效的影响^[6];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个人消费市场,深入探讨消费信贷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并分析消费行为的数字足迹如何提升违约预测的准确性及信贷可得性^[7,8].国内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3],尤其集中于法学领域的理论思辨,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社会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较为匮乏,少量研究开始关注信用环境对于民营企业成长、小微企业融资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9,10],然而鲜有文献明确考察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创业活力之间的联系.

鉴于此,本研究将从创业的角度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经济效应.对于转型期的经济体而言,创业不仅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引擎,也是解决就业难题的有效途径^[11].《“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中明确指出要“不断优化创业环境”、“持续释放创业带动就业尤其是高质量就业的动能”.创业不仅对推动新旧动能转化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信用制度的本质是契约精神,以信用为内核的隐形契约执行机制有利于降低道德风险,推动更多潜在企业进入市场,激发合作创新活动^[12].因此,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如何激发地区创业活力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借助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

城市这一政策冲击探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创业的影响效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于 2015 年和 2016 年联合确定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以下简称“信用示范创建城市”).信用示范创建城市旨在通过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良好的信用环境,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先进经验和创新实践.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是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该项试点也为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提供了自然实验分析的条件.

本研究首先基于具体制度背景和相关文献,梳理了以创建信用示范城市为重要载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影响创业的理论逻辑,并验证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地区信用环境的改善效果,具体表现为商务诚信、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水平的提升.接着利用 2010 年至 2019 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具体而言,入围信用示范创建的城市,创业活力平均提高了 20.9%,相当于城市创业活力平均值的 24%.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影响、控制省份-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潜在试点选择变量的时间趋势和倾向得分匹配等多种方法,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机制分析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是社会信用体系促进创业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的效果在社会信任水平和法治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这意味着信用制度建设与信任文化塑造、法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有如下三点:第一,现有国际文献往往强调私人征信机构的积极作用,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1,2].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着眼于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需求,是以有为政府建设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研究揭示了有为政府在塑造有效市场中的重要作用,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进而促进市场主体活力提供了中国证据和中国经验;第二,以信用示范创建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分析,为估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创业活力

的影响提供了较为可靠的量化评估结果;第三,将各类宏微观数据结合,进一步探究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重点关注了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业的影响,并发现了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和法治化程度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效果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为深入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经济意义和作用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同时也可以为如何进一步形成健全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充分发挥其对创业的推动作用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制度背景与理论机制

1.1 制度背景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年—2020年)》,意味着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该纲要明确了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框架,其宗旨是以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为基础,以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为主要内容,以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为重点。在纲要的指导下,2015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将沈阳市等11个城市列入首批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2016年4月,两部门再次确定了乌海市等32个信用示范创建城市,以创建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助力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示范创建城市是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先行区,其创建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通过搭建地方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与“信用中国”网站联通,实现了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公开和共享。平台汇集了信用制度方面的政策法规,以及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基本信息,除此之外,还囊括了纳税信用状况、信用承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守信红榜、失信黑榜、公共服务费用(比如水电费)支付情况等信息。同时实现了跨部门、跨机构、跨地区

的信用信息互联共享。

另一方面,提高了契约执行力。通过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大格局,提高市场主体守信的收益和失信的成本,从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城市的创业活力。例如,荣成市在多个领域开展“信易+”应用场景,为守信群体提供“信易批”、“信易贷”和“信易租”等守信激励政策,其中“信易批”旨在为诚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提高办事效率,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方面,通过前置“信用承诺”简化行政审批。“信易贷”旨在为诚信企业或个人放宽授信额度和还款期限并给予利率优惠。“信易租”旨在为守信创业企业提供生产或办公设备、生产车间、办公场所等便捷租赁服务,同时减免相关租赁费用。再比如潍坊市强化失信联合惩戒,构建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严重失信的市场主体,在申请贷款、项目立项和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限制。

1.2 理论机制

社会信用是提供社会资本、获得金融资本的桥梁,是创业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研究从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论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

1.2.1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激发地区创业活力

资金是创业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创业者的资产往往不能满足创业的初始资金需求,因而信贷可得性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13]。然而,创业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导致信贷配给现象,降低了创业者对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最终阻碍了企业的创立。

一方面,信用示范创建城市通过搭建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了企业信用信息的公开与共享,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的共享整合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充分评估企业的还款履约能力。例如,在“银税互动”融资模式中,税务部门对纳税信用等级的披露减少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显著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其信贷可得性^[14]。另一方面,信用示范城市的创建加大了失信惩戒力度和契约执行力,地区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效缓解企业

的融资约束^[15],反之,如果地区的契约执行效率低,企业更容易出现拒还贷款从而对银行敲竹杠,银行为了抵御潜在损失会提高事前的贷款利率^[16]。

1.2.2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激发地区创业活力

企业经营面临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企业创始期,不确定性更为显著,政策不确定性是其中一种,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出台重要政策时缺乏科学论证程序、随意变更;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重招商轻落地、轻服务,引来企业后对此前承诺敷衍推脱甚至不予兑现;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基于强势地位不履约向民营企业支付款项或以政府换届等理由毁约。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行为决策产生一系列影响。相关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17,18]。此外,对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关系,相关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抑制企业投资^[19],不确定性环境下投资机会的放弃促使企业增加现金持有^[20]。政策不确定性除了给企业带来一系列影响外,还影响了银行、风险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的行为决策。当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时,银行资产组合中的贷款份额会下降^[21],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企业和早期阶段企业的投资比重也会下降^[22]。总而言之,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创业的背景风险和潜在成本,从而抑制市场主体的创业决策。

一方面,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强调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作为政务诚信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创业者充分把握政策调整和创业信息资源,有效提升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23]并降低了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24,25]。另一方面,信用示范城市的创建加快了地方社会信用法规的出台,推动信用法制化进程,契约制度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冲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面冲击^[26]。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显著影响城

市创业活跃度,以 2015 年和 2016 年分两批创建的信用示范城市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Entre_{it} = \alpha + \beta CreditCity_{it} + \gamma X_{it} + \delt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Entre_{it}$ 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创业活跃度,用城市每百人新创企业数来衡量; $CreditCity_{it}$ 为信用示范创建城市虚拟变量,如果城市 i 在年份 t 为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则取 1,否则取 0; β 是本研究关注的估计系数,表示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创业活跃度的平均处理效应; X_{it} 是一系列可能会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控制变量; δ_t 和 μ_i 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年份宏观经济环境差异和不同地区固有禀赋差异等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2.2 数据来源

新创企业数据来源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工商企业注册信息,包含新注册企业的名称、地址、注册时间、企业类型等信息。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分权度等控制变量的信息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3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创业活跃度。创业活跃度是衡量地区层面创业积极性的核心指标^[27],本研究利用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得到各个城市每年的新注册企业数量,考虑到区域的人口规模差异,以城市人口数为标准化基数,采用城市新增企业数与城市人口(百人)的比值衡量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2)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虚拟变量。为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文确定了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入围名单,首批自 2015 年开始创建,共包括 8 个城市,第二批自 2016 年开始创建,共包括 32 个城市。本研究将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变量定义为:某城市开始创建信用示范城市的当年和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这样就可以比较创建城市与未创建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在创建前后的差异。

3) 控制变量。结合现有研究^[27],具体控制了如下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 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表示;财政分权度,用政府预算收入与政府预算支出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程度,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与

GDP 的比值表示; 金融发展水平, 用机构贷款余额与 GDP 的比值表示; 人口密度, 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表示; 研发投入, 用科学支出和 GDP 的比值表示。

表 1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研究针对 2010 年—2019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展开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北京市和上海市等直辖市是在区

层级开展的信用示范创建工作, 同时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地位、资源占有等方面的特殊性, 本研究的样本剔除了直辖市, 此外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观测对象, 最终形成了 2 586 个城市一年层面的面板观测。创业活跃度的均值为 0.867, 表明在该样本区间内, 平均而言, 每年每万人的新创企业数为 87 家。

表 1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Summary statistics

变量名	指标计算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业活跃度	每百人新增企业数(个/百人)	2 586	0.867	0.614	0.070	9.351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的对数值	2 586	10.660	0.553	8.881	12.281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2 586	0.458	0.113	0.115	0.797
财政分权度	政府预算收入与政府预算支出的比值	2 586	0.472	0.216	0.069	1.541
对外开放程度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占 GDP 的比重	2 586	0.018	0.018	0.000	0.210
金融发展水平	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	2 586	0.943	0.572	0.132	7.450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人口数的对数值	2 586	5.792	0.884	1.619	7.923
研发投入	科学支出占 GDP 的比重	2 586	0.003	0.003	0.000	0.063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政策效果验证

在分析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创业的影响效应之前, 本研究首先对该政策能否带来地区信用环境的改善进行了检验, 具体检验了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在商务诚信、政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四大领域的建设效果, 表 2 汇报了相应的结果。商务诚信采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衡量, 该指数被官方发布机构认定为测量商务诚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的指标, 指数来源于《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蓝皮书》, 目前已发布 6 期, 分别测算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的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水平, 其余年份的商业信用环境指数采用等差法进行插值补充, 表 2 第(1)列汇报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地区商务诚信的影响效应,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变量的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可以看出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显著提高了城市的商务诚信水平。政务

诚信和社会诚信分别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个体对地方政府官员、陌生人的信任度在城市一年份层面的平均值衡量, 表 2 第(2)列的结果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提升了政务诚信水平, 表 2 第(3)列的结果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没有促进社会诚信, 这与经验直觉以及以往文献是一致的, 社会诚信作为一种文化, 其变迁过程相当缓慢, 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明显的改变^[28]。司法公信的衡量方面, 本研究采用王小鲁等^[29]编撰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分指数进行衡量, 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分指数的依据之一是企业调查数据中企业对公检法机关执法公正及效率情况的评价, 其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地区的司法公信状况。受市级市场化指数数据的限制, 本研究参考范子英和赵仁杰^[30]的处理方式, 以市级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占省级政府一般财政支出的比值为权重, 乘以市场化指数的倒数, 从而得到城市层级的司法公信状况, 表 2 第(4)列中信用示范创建城市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显著提升了地区的司法公信水平。

表 2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效果验证
Table 2 Credit city construction effect verification

变量名	(1) 商务诚信	(2) 政务诚信	(3) 社会诚信	(4) 司法公信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1.636 ***	0.156 *	-0.037	0.146 ***
	(0.167)	(0.081)	(0.067)	(0.0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822	0.643	0.562	0.900
样本量	2 578	405	405	2 586

注：该表汇报了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在商务诚信、政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四大领域的创建效果。其中，商务诚信采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蓝皮书》发布的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衡量；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分别采用中国社会追踪调查（CFPS）中个体对地方政府官员、陌生人的信任度在城市层面的平均值衡量；司法公信由《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分指数乘以市财政支出占省财政支出之比构造。*、**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3.2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提高地区的创业活力，表3汇报了以信用示范城市创建为载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基准回归结果。表3第（1）列的估计值为没有控制其他因素下，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表3第（2）列在表3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分权度等经济因素，表3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人口密度和研发投入。这三列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且系数大小无较大差异，说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应不仅在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经济意义也相当明显。以表3第（3）列的结果为

准，信用示范创建城市的估计系数为0.209，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用示范城市创建使城市的创业活力平均提高了20.9%，相当于城市创业活力平均值的24%。此外，考虑到金融服务是影响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比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可以使城市创业活力提升约6.8%，不难发现信用示范城市创建的效果相当于金融发展水平提高3个标准差。

表3中控制变量的系数也大多与现有文献的发现和理论预期相符。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意味着更多创业机会、更完善的创业服务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创业活动的产生。人口密度增加带来的城市集聚经济能够显著增加创业活动^[31]。

表 3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Table 3 The impact of credit city construc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vitality

变量名	城市创业活跃度		
	(1)	(2)	(3)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0.261 ***	0.242 ***	0.209 ***
	(0.040)	(0.039)	(0.037)
经济发展水平		0.519 ***	0.435 ***
		(0.081)	(0.082)
产业结构		-0.146	-0.046
		(0.273)	(0.265)
财政分权度		0.135	0.139
		(0.117)	(0.116)

续表 3

Table 3 Continues

变量名	城市创业活跃度		
	(1)	(2)	(3)
对外开放程度		-0.604 (0.665)	-0.616 (0.666)
金融发展水平		0.123 *** (0.035)	0.119 *** (0.034)
人口密度			1.162 *** (0.263)
研发投入			4.482 (3.580)
常数项	0.654 *** (0.080)	-4.809 *** (0.964)	-11.573 *** (1.704)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调整 R^2	0.698	0.710	0.715
样本量	2 586	2 586	2 586

3.3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性的前提是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如果没有进行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应当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参考 Li 等^[32]的研究,使用事件分析法检验平行趋势假定是否得到满足。模型设定如下

$$Entre_{it} = \alpha + \sum_{k=1}^5 \beta_k B_k + \sum_{k=0}^4 \alpha_k A_k + \gamma X_{it} + \delt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B_k 和 A_k 分别代表的是信用示范城市创建的前、后 k 年的虚拟变量,其估计系数 β_k 和 α_k 分别表示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开始的前、后第 k 年,信用示范创建城市与非创建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差异,其余符号的含义与式(1)相同。如图 1 所示,在创建之前,信用示范创建城市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创建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不存在显著差异,平行趋势检验通过。而在创建后,估计系数值均显著为正且不断增大,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于创业的促进效应呈现出递增的态势。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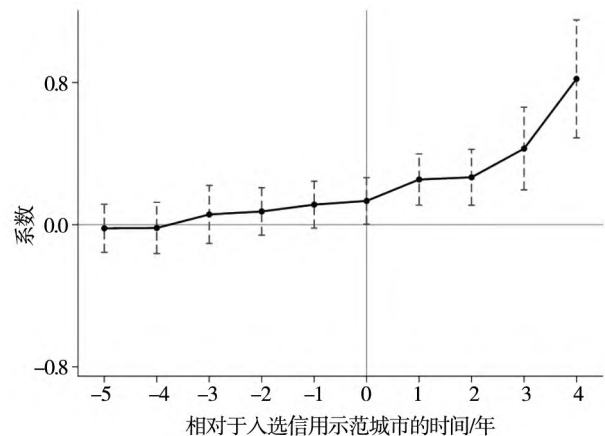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Fig. 1 Parallel-trends test

注:该图中的实线描绘了由式(2)回归得到的创建前和创建后估计系数 $\hat{\beta}_k$ 和 $\hat{\alpha}_k$ 的变化趋势(以基期为基准组),虚线范围内为相应的 95% 置信区间。

3.4.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不同文献对创业活跃度的衡量方式不同,在上文基准回归模型中,本研究以城市每百人的新创企业数来衡量城市的创业活力,在此处参考谢绚丽等^[33]的做法,分别以城市每年新注册企业数的对数、私营和个体从业数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创业活力,同样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由表 4 第(1)列和表 4 第(2)列的估计结果可知,信用示

范城市创建对创业的促进效应依然存在 ,与表 3 的估计结果一致 ,说明本研究的主要结果没有受到创业活跃度测量方式的影响。

3.4.2 控制其他政策性事件冲击

为了避免相似时间段内其他地区层面可能会影响创业的政策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本研究搜集并整理了在此时间区间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以及实施的知识产权城市试点信息。自贸区 and 国家级新区的建设都加快了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放松对市场管制的同

时 ,着力优化市场环境和增强金融服务 ,为创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34]。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和服务 ,从而激发创新活力、推动高质量创业。为排除上述政策的潜在影响 ,聚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一维度 ,本研究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自贸区设立、国家级新区设立以及知识产权城市政策虚拟变量 ,估计结果见表 4 第(3)列 ,可以看出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于创业的促进效应仍然存在 ,未受到其他政策冲击的影响。

表 4 稳健性检验
Table 4 Robustness tests

变量名	(1)	(2)	(3)	(4)	(5)	(6)
	新注册企业数	私营和个体从业数占比	排除其他政策	控制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潜在试点选择标准* 时间趋势	匹配 - 双重差分法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0.063 *** (0.024)	0.019 * (0.010)	0.125 ** (0.054)	0.179 *** (0.039)	0.108 ** (0.045)	0.105 ** (0.044)
			0.257 * (0.142)			
自贸区			0.187 ** (0.078)			
			0.097 *** (0.036)			
国家级新区						
知识产权城市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942	0.772	0.720	0.755	0.727	0.679
样本量	2 586	2 198	2 586	2 586	2 586	1 491

注：该表采用以下多种方式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1)列替换被解释变量为每年城市新注册企业数的对数；第(2)列替换被解释变量为私营和个体从业数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第(3)列控制了自贸区城市、国家级新区设立城市和知识产权城市；第(4)列控制了省份 - 时间联合固定效应；第(5)列以信用示范城市创建之前的商业信用环境指数作为潜在试点选择标准 ,控制了潜在试点选择标准和时间趋势的交叉项；第(6)列采用 PSM-DID 方法重新估计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所有回归的控制变量与表 3 第(3)列一致 ,为了节省篇幅未汇报。以下各表同。

3.4.3 控制省份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随时间和地区变动的因素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本研究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这一方法可以排除所有在省份和年度间变化的(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例如不同省份在创业趋势上的系统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表 4 第(4)列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信用

示范城市创建对城市创业活力影响的估计系数依然正向显著 ,说明上文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3.4.4 控制潜在试点选择标准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的选择可能存在非随机性 ,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在确定信用示范创建城市时 ,可能会参考某些特定标准以确保试点成效 ,例如 ,以往商业信用环境好的城市 ,在进

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有可能优先入围。如果该“标准”也会影响城市创业活力,那么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和非创建城市在创建后的创业活力差异很有可能是由这些选择偏误导致的。为了缓解试点城市选择不随机造成的估计偏误,本研究采用宋弘等^[35]的方法,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创建前城市的商业信用环境指数和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从而控制了城市之间在期初商业信用环境的差异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对于创业活力的影响。表4第(5)列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考虑到潜在试点选择标准的可能影响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3.4.5 匹配-双重差分法

考虑到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和非创建城市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从而导致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进一步使用PSM-DID方法缓解非随机选择造成的偏差。首先采用人均GDP、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作为匹配指标,通过Logit模型估计出每个城市入围信用示范创建城市的概率(倾向得分),接着根据倾向得分并借助核匹配方法为处理组(进行信用示范创建的城市)匹配到各方面特征相似的对照组(未进行信用示范创建的城市),最后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估计式(1),回归结果如表4第(6)列所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活力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4.6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其他不可观测特征的影响,本研究借鉴Li等^[32]的做法,采用随机生成信用示范创建城市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依次不重复地在2015年、2016年随机生成11个、32个信用示范创建城市,然后将随机生成的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变量替换真实的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变量进行回归,再将这个过程重复1000次。图2描绘了这1000个虚假处理变量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可以看出,随机生成的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对创业活力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0的附近且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而真实的系数估计值(图2中的垂

直虚线)明显向右偏离该分布,这说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应确实存在,而非偶然的观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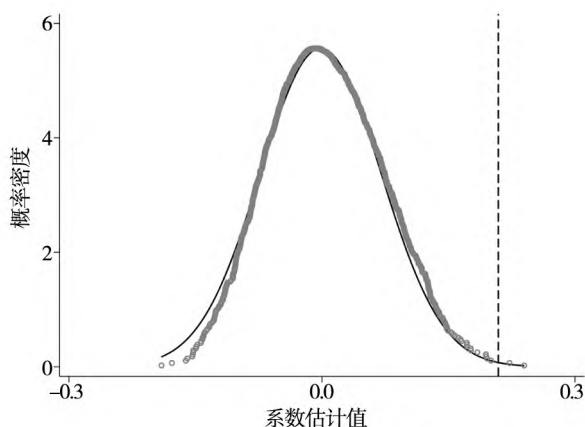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

Fig. 2 Placebo test

注:本图绘制了基于1000次随机选择信用示范创建城市模拟得到的“虚假”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垂直的虚线表示的是表3第(3)列中“真实”的估计系数。

4 进一步分析

4.1 机制检验

基于理论分析,本研究从缓解信贷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检验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

基于相关文献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在吸引风险投资、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和增加商业信用融资等三方面的效果验证缓解融资约束这一机制。在信用示范城市创建的过程中,基于大数据等多种技术方式加强了公共信用信息和金融信息的共享整合,缓解了企业与银行、风险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加了企业获得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和以家庭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的能力。此外,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公开也使得创业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创业企业受到流动性约束时,其凭借自身的信用可以更多地从供应商处赊购原材料,以提高生产效率。根据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问卷设计度量家庭信贷

约束,如果家庭没有银行贷款的原因是“需要但没有申请、或者申请被拒绝”,则“家庭信贷约束”等于 1,否则为 0.参考龙玉等^[36],采用城市获得风险投资案例总数的对数和城市获得风险投资总金额占当年全国风险投资总金额的比重衡量城市吸引风险投资的能力^②.参考李双建等^[37],采用上市公司应付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在“城市-年份”层面的平均值衡量商业信用融资.表 5 汇报了相应的结果.

表 5 第(1)列、表 5 第(2)列的结果显示,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对城市风险投资案例数和城市

获得风险投资总金额占当年全国风险投资总金额的比重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可以显著增强了城市吸引风险投资的能力.表 5 第(3)列的结果显示,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有效缓解了家庭的信贷约束,提高了家庭对于银行贷款的可得性.表 5 第(4)列的结果显示,信用示范创建城市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能够增加这些城市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

表 5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的机制检验：缓解信贷约束

Table 5 A mechanism test of credit city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asing credit constraints

变量名	(1)	(2)	(3)	(4)
	风险投资案例数	风险投资金额占比	家庭信贷约束	商业信用融资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0.160 ***	0.003 **	-0.016 *	0.655 *
	(0.056)	(0.001)	(0.009)	(0.3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785	0.371	0.157	0.652
样本量	2 586	2 586	56 366	2 153

注：该表验证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通过吸引风险投资、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增加商业信用融资从而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第(1)列、第(2)列分别采用城市获得风险投资案例总数的对数和城市获得风险投资总金额占当年全国风险投资总金额的比重衡量城市吸引风险投资的能力;第(3)列使用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家庭信贷约束指标;第(4)列采用上市公司应付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在城市-年份层面的平均值衡量商业信用融资.

为了进一步探索可能的机制,本研究将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经济周期波动两个方面衡量创业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以检验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地区创业活力的促进效应是否增强.

首先,根据新创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将新创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其中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拥有更为紧密的关系网络,国有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任职交流频繁^[24],这些使得国有企业对于政策信息的可得性更高,从而降低了国有

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想比之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面临着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表 6 第(1)列、表 6 第(2)列分别报告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创业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信用示范城市创建能够显著增加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更大的非国有企业的创业,而对于国有企业创业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经济周期波动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经济下行期比经济上行期存在更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本研究参考于文超等^[24],使用 GDP 增长率划

② 风险投资交易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将融资企业的注册地址对应到具体的地级市,将风险投资案例数和风险投资金额在“城市-年份”层面加总.由于部分融资企业的地址信息不齐全,难以对应到具体的地级市名单,为此,利用百度地图 API 接口将这些地址进行补全,并进一步分配对应到具体的地级市.

分经济上行期和经济下行期,当某一城市的 GDP 增长率低于该城市样本期(2010 年—2019 年)中位数时,则视为为经济下行期,反之为经济上行期。表 6 第(3)列、表 6 第(4)列分别报告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经济下行期、经济上行期创业的影响效应,不难发现,信用示范创建城市虚拟变量

的系数在经济下行期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而信用示范创建城市虚拟变量的系数在经济上行期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这意味着,在经济下行期,当创业企业面临更多的政策不确定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城市的创业活力。

表 6 信用示范城市创建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的机制检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

Table 6 A mechanism test of credit city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Reducing policy uncertainty

变量名	(1)	(2)	(3)	(4)
	非国企	国企	经济下行期	经济上行期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0.054 **	0.033	0.150 ***	0.031
	(0.024)	(0.065)	(0.053)	(0.0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948	0.717	0.663	0.856
样本量	2 335	2 335	1 291	1 037

注:该表验证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第(1)列、第(2)列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更大的非国有企业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强;第(3)列、第(4)列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处于经济下行期的城市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强。

4.2 信任文化与法治水平的调节效应

信用是基于信任发生的经济关系,不同于信任强调人际交往及经济往来中施加于对方的道德信心,信用是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伴随着借贷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其内核是契约精神^[9]。本研究进一步考察社会信任水平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创业中的调节效应。采用两种方式衡量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第一,参考张维迎和柯荣住^[38],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的第一信任度衡量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即总样本中有多少比例的人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第二,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心组织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 2014 年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这种看法?”为依托,将受访者的回答“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按信任水平分别赋值为 1、2、3、4,将每个城市所有居民的选择取平均值作为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代理变量,然后按照各个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中位数将地区分为高信任水平的地区 and 低信任水平的地区。表 7 第(1)列、表 7 第(2)列报告了地区社会信任水平

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不难发现,信用示范创建城市与地区信任水平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社会信任水平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创业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法治完善程度是高质量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地区的法治环境直接影响着地区信用信息开放和隐私保护的界限、征信机构经营的规范程度、失信行为的执行效率。本研究采用市场中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分指数以及各省执业律师人数衡量地区法治水平,表 7 第(3)列、表 7 第(4)列报告了地区法治环境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信用示范创建城市与地区法治环境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法治环境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创业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上述结果意味着信用建设与法治建设、诚信文化建设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旨在激发地区创业活力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从法治建设和文化塑造两方面去推动,即以信用法律制度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外在约束力,以信用文化培植增强信用主体的内在道德约束。

表 7 社会信任和法治环境调节效应
Table 7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trust and rule of law environment

变量名	城市创业活跃度			
	(1)	(2)	(3)	(4)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 第一信任度	0.020 [*]			
	(0.011)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 高信任水平地区		0.184 ^{**}		
		(0.082)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 法治环境指数			0.017 ^{**}	
			(0.008)	
信用示范创建城市 × 律师人数				0.121 [*]
				(0.0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715	0.741	0.716	0.783
样本量	2 586	1 025	2 586	2 349

注：该表验证了社会信任水平和法治环境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创业的正向调节效应。第一信任度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高信任水平地区为二元虚拟变量，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构造；法治环境指数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省执业律师人数根据《中国律师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整理。

5 结束语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政府主导、全方位、数字化平台运作的赋有中国特色的信用体系。本研究从创业的视角出发评估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经济效应，是有为政府塑造有效市场的有力验证，也为信用体系建设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创建信用示范城市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推动信用体系建设稳步向深向实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执行力两个角度为设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等信用示范创建城市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经济学理论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首先验证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确实能改善地区的信用环境，具体表现为创建城市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水平显著提升，接着基于工商企业注

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以“信用示范创建城市”为载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研究发现，信用示范城市的创建能够显著激发城市创业活力。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的结论。机制分析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对创业活力的作用机制是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在社会信任和法治水平更高的地区能够发挥更强的创业促进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有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借助数字化信用平台，进一步推进信用信息公开、归集与共享，缓解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推动信用信息在全国范围内跨地区、跨部门的共享共用，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信用信息的融合应用，打破信用信息“孤岛”。以信用为依托缓解创业企业与银行、投资机构、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合作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对于缓解创业企业的资金约束、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交流以及扩大市场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二，不同部门应充分挖掘和发挥信用的价值，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政府部门应广泛推行信用

承诺制,以信用承诺简化的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以信用承诺的履约情况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信用信息在为中小微企业资金纾困上的积极作用,考虑到企业在创立初期大多为中小微企业,具有“轻资产”特征,普遍缺乏抵押品,金融机构应提高信用贷款的可得性,充分利用各类信用信息进行贷款人筛选,给予守信的创业者更优惠的利率和更便捷的贷款审批通道,降低创业的融资门槛。

第三 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引导市场主体形成合理预期。一方面,政府应守信践诺,避免经济政策频繁调整、随意变更,另一方面,提高政策信息的透明度,在新政策出台或政策进行关键调整时需要就政策的背景、实施目的、具体措施和可能产生的疑问进行详细的解读说明,使市场

主体尤其是缺乏内部信息的民营企业能够及时接收并充分理解政策内涵。

第四 形成法律信用制度和诚信道德规范的治理合力,更大程度激发创业活力。由于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在法治化程度和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能够发挥更强的创业促进效应,因此现阶段要从制度硬约束和道德软约束两个维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创业活动提供高水平的信用环境,从而更大程度激发企业家精神。“制度硬约束”不仅包括加快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还包括进一步提高契约的执行力,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具体举措。“道德软约束”指加快培育全社会的诚信意识,通过提高诚信教育水平、树立诚信典型等多种方式塑造城市的诚信文化,进而扩大社会的信任半径。

参 考 文 献:

- [1] Barth J R, Lin C, Lin P, et al. Corruption in bank lending to firms: Cross-country micro evidence on the beneficial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91(3): 361–388.
- [2] Grajzl P, Laptieva 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volume of private credit in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Ukrainian bank-level panel dat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6, 44(2): 434–449.
- [3] 谢新水, 吴芸. 新时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从政府赋能走向法的赋能[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 (7): 31–35.
Xie Xinshui, Wu Yu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in the new era: From government enabling to law enabling[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9, (7): 31–35. (in Chinese)
- [4] 胡业飞, 傅利平, 敬义嘉, 等.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 研究展望[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8): 91–104.
Hu Yefei, Fu Liping, Jing Yijia, et al. Public governance and its scientific law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An outlook of research trend[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1, 24(8): 91–104. (in Chinese)
- [5] Kliger D, Sarig O. The information value of bond ratings[J].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55(6): 2879–2902.
- [6] Klapper L, Laeven L, Rajan R. Entry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82(3): 591–629.
- [7] Herkenhoff K, Phillips G M, Cohen-Cole E. The impact of consumer credit access on self-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1, 141(1): 345–371.
- [8] 胡俊, 李强, 曾勇, 等. 数字足迹与违约预测: 基于消费信贷的证据[J]. *管理科学学报*, 2025, 28(2): 115–139.
Hu Jun, Li Qiang, Zeng Yong, et al. Digital footprints and default prediction: Evidence from consumer credi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5, 28(2): 115–139. (in Chinese)
- [9] 余泳泽, 郭梦华, 胡山. 社会失信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来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9): 137–155.
Yu Yongze, Guo Menghua, Hu Shan. Social dishonest enviro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rban dishonest people[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0, (9): 137–155. (in Chinese)

- [10]钱水土, 吴卫华. 信用环境、定向降准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经验研究[J]. 财贸经济, 2020, 41(2): 99–114.
Qian Shuitu, Wu Weihua. Credit environment, directional RRR cut policy and the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credit financing: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20, 41(2): 99–114. (in Chinese)
- [11]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theor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8, 58(2): 64–71.
- [12]夏杰长, 刘 诚. 契约精神、商事改革与创新水平[J]. 管理世界, 2020, 36(6): 26–36+48+242.
Xia Jiechang, Liu Cheng. Contract spirit, commercial system reform and innov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6): 26–36+48+242. (in Chinese)
- [13]彭克强, 刘锡良. 农民增收、正规信贷可得性与非农创业[J]. 管理世界, 2016, (7): 88–97.
Peng Keqiang, Liu Xiliang.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ccess to formal credit and off-farm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6, (7): 88–97. (in Chinese)
- [14]陈 彪, 罗鹏飞, 杨金强. 银税互动、融资约束与小微企业投融资[J]. 经济研究, 2021, 56(12): 77–93.
Chen Biao, Luo Pengfei, Yang Jinqiang. Bank tax interacti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vestment for SME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1, 56(12): 77–93. (in Chinese)
- [15]杨 畅, 庞瑞芝. 契约环境、融资约束与“信号弱化”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7, (4): 60–69.
Yang Chang, Pang Ruizhi. Contract environment,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signal weakening” effec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7, (4): 60–69. (in Chinese)
- [16]李俊青, 刘帅光, 刘鹏飞.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企业进入与产品市场竞争[J]. 经济研究, 2017, 52(3): 136–150.
Li Junqing, Liu Shuaiguang, Liu Pengfei. Financial contract enforcement, entry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3): 136–150. (in Chinese)
- [17]于文超, 高 楠, 龚 强. 政贵有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 2022, 22(2): 425–444.
Yu Wenchao, Gao Nan, Gong Qiang. Consistency is valuable in governance: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firms' 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2, 22(2): 425–444. (in Chinese)
- [18]才国伟, 吴华强, 徐信忠. 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J]. 金融研究, 2018, (3): 89–104.
Cai Guowei, Wu Huaqiang, Xu Xinzong.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policy uncertainty on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behavior[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8, (3): 89–104. (in Chinese)
- [19]李 睿, 张露平, 王 欢, 等.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J]. 管理科学学报, 2025, 28(2): 31–49.
Li Rui, Zhang Luping, Wang Huan, et al.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5, 28(2): 31–49. (in Chinese)
- [20]李凤羽, 史永东.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16, 19(6): 157–170.
Li Fengyu, Shi Yongdo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cash holding strategy: Empirical research by using China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6, 19(6): 157–170. (in Chinese)
- [21]邱兆祥, 刘远亮.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资产组合行为: 1995~2009[J]. 金融研究, 2010, (11): 34–44.
Qiu Zhaoxiang, Liu Yuanliang.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banks' asset portfolio behaviors: 1995~2009[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0, (11): 34–44. (in Chinese)
- [22]彭 涛, 黄福广, 孙凌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 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3): 98–114.
Peng Tao, Huang Fuguang, Sun Lingxia.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venture capital[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1, 24(3): 98–114. (in Chinese)

- [23]芮国强,宋典.信息公开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96-101.
Rui Guoqiang, Song Dian.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how the publ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ffects government trust [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2, (11): 96-101. (in Chinese)
- [24]于文超,梁平汉,高楠.公开能带来效率吗?——政府信息公开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20,19(3):1041-1058.
Yu Wenchao, Liang Pinghan, Gao Nan. Can higher level of disclosure bring greater efficienc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firms' investment efficiency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0, 19 (3): 1041-1058. (in Chinese)
- [25]Hope O K, Jiang S, Vyas 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firm-level operational efficiency [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22, 49(5-6): 752-777.
- [26]杨瑞龙,章逸然,杨继东.制度能缓解社会冲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冲击吗? [J]. 经济研究, 2017, 52(8): 140-154.
Yang Ruilong, Zhang Yiran, Yang Jidong. Do institutions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ocial conflict on enterprises' risk-taking?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8): 140-154. (in Chinese)
- [27]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 2020, 36(10): 65-76.
Zhao Tao, Zhang Zhi, Liang Shangkun. Digital economy, entrepreneurship,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10): 65-76. (in Chinese)
- [28]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526-556.
- [29]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Wang Xiaolu, Fan Gang, Hu Lipeng. Marketization Index of China's Provinces: NERI Report 2018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9. (in Chinese)
- [30]范子英,赵仁杰.法治强化能够促进污染治理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J].经济研究, 2019, (3): 21-37.
Fan Ziyang, Zhao Renjie. Does rule of law promote pollution control? Evidenc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urt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9, (3): 21-37. (in Chinese)
- [31]张萃.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 [J]. 经济研究, 2018, 53(4): 151-166.
Zhang Cui. What makes cities more entrepreneurial?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8, 53(4): 151-166. (in Chinese)
- [32]Li P, Lu Y,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3: 18-37.
- [33]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4): 1557-1580.
Xie Xuanli, Shen Yan, Zhang Haoxing, et al. Can digital finance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8, 17(4): 1557-1580. (in Chinese)
- [34]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8):60-77.
Yuan Hang, Zhu Chengliang. Do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8, (8): 60-77. (in Chinese)
- [35]宋弘,孙雅洁,陈登科.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 2019, 35(6): 95-108+195.
Song Hong, Sun Yajie, Chen Dengke. Assessment for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6): 95-108+195. (in Chinese)
- [36]龙玉,赵海龙,张新德,等.时空压缩下的风险投资——高铁通车与风险投资区域变化[J].经济研究,2017,52

(4): 195–208.

Long Yu, Zhao Hailong, Zhang Xinde, et al. High-speed railway and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4): 195–208. (in Chinese)

[37] 李双建, 李俊青, 张 云. 社会信任、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创新[J]. 南开经济研究, 2020, (3): 81–102.

Li Shuangjian, Li Junqing, Zhang Yun. Social trust, commercial credit financing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20, (3): 81–102. (in Chinese)

[38]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 (10): 59–70+96.

Zhang Weiyang, Ke Rongzhu. Trust in China: Across-regional analysi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2, (10): 59–70+96. (in Chinese)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ship vitali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system: Evidence from China

NIU Geng¹, HE Yu-ke^{2*}, ZHAO Guo-chang¹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Institute of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fos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taken a distinctive path, which is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digit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Based on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credit construction pilot c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new firm registration data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China (SAIC)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vitality with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framework.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redit construction pilot citie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credit system,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urban entrepreneurship. It is proved that the policy has improved the levels of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judicial integrity.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indicat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cities could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ing policy uncertainty.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redit city construc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is greater in regions with high levels of social trust and the rule of law, indicat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culture of trust and the rule of law are both important supports for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research assesses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vides Chinese evidence that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can help develop an efficient market. The findings are important for further promoting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effective government; entrepreneurship vitality